



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列



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
(1920—1937)



MODENG SHANGHAI DE HONGSE GEMING CHUANBO

杨卫民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1920—1937)

杨卫民 ◎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1920—1937/杨卫民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 12

(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列)

ISBN 978-7-5671-2010-5

I. ①摩… II. ①杨… III. ①出版事业—文化史—研究—上海市—1920~1937 IV. ①G23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3884 号

责任编辑 徐雁华

封面设计 倪天辰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1920—1937)

杨卫民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4.5 字数 400 千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2010-5/G·2039 定价：68.00 元

在温暖的大地上(代自序) | Preface

“所有我的创作，都来源于温暖的大地。”俄罗斯艺术大师西德罗夫如是说。我喜欢他画作的清新自然，敬佩他对童年记忆中阳光和欣喜的珍视，更欣赏他通过生活的细节贴近普通人心灵的深处。因此，我借用大师的油画主题，来激励自己的文字、思维和情感交融。

2008年秋天，缘于对学术思考的热爱，基于硕士期间攻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方向的经历，我报考了忻平教授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以图对此问题有更系统和深入的探究。翌年春天，我离开出版单位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后，根据老师此时主要致力于上海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情况，顺其自然进入此领域。

有时候，选择也是一种人生的痛苦。但在中年辞职读博乃至后来到高校工作的选择上，以及在研究方向的改变上，我都没有感到痛苦，反而觉得欣喜，因为自己长时间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并且乐此不疲。

我对现代化的理论认知，源于大学毕业之际阅读罗荣渠、高清海等先生的文章和书籍；而我将问题落脚于中国实践，则离不开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系列的文字影响和思想启迪。如今，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更为深入和伟大，社会生活的面相也更为宏阔和突出，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突破正当其时。因此，无论是宏观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研究，还是相对中观和微观的社会生活研究，都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说，人类的具体历史，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所有人的历史，也必然是人类的一切希望、斗争和受难的历史。在我心中，生命、生存、生活、生态，是一项项非常重要甚至伟大的事业，要求我们实实在在，来不得那么多虚头滑脑和折腾胡闹，每个人必须给予其应有的重视。而我也乐于在大众生活的五彩缤纷中，去寻找质朴的人生真谛。

生活的世界意义非凡。为了获取成功或追求真理，人们苦苦挣扎或奋力前

行。在仰望星空和俯视大地之间,力量 and 生命之花竞相绽放。生命的真实感和内在的厚度,超越历史的围墙。沿着社会生活史的探索小径,正有不少专家、学者努力开拓。政治的风雨、经济的丛林、文化的光影,拂动着岁月的斑斑驳驳,交织着生活的平平仄仄。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缩影,上海近代的草木风情越来越多地映入研究者的视野,其间的英雄踪迹和大众群像由此愈加鲜活可观。

虽然意识形态曾狂热地激荡着 20 世纪的历史,并且动荡、战乱和灾难等一度袭击人的心灵,但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朴实的人性之光烛照生活的道路,都有不屈的开拓创新坚定未来的方向。本书在 1920—1937 年的都市上海大背景下,试图寻绎中国共产党出版人(以下简称“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落脚于根处,解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从而梳理革命和现代之间的心灵关联。

中华文明的历史,是一部连绵不绝的社会生活史,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是一部紧紧立足于大地的历史。而扎根于温暖的大地,可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生机勃勃。本书前两章,对中共出版人做了整体考察。首先可以看到上海都市社会发展对中共出版人群体的产生、成长和发展的影响。中共出版人起源于都市化的上海,并且是在一种多元化的社会场景中产生的。上海在其都市化进程中,不但产生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形态(物),也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群体(人),更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文化和革命基础(精神)。正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市民群体和市民文化,在最为基本的物质形态、市场需求、文化精神等方面为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沃土。而在对上海生活的认识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在多种话语体系的博弈中,中共出版人积极进行红色革命传播,激发了其人格重塑中革命性和现代性以及城市文化的交融,这是其生活实践的现实根基和文化背景。承接以上内容,本书对中共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总结,并通过搜集的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一整体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创造和青春的契合、文化和情感的相融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可以说,中共出版人群体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社会影响辐射到了全国各地,创新精神浸润到历史的深层中去。

既然扎根土地,就要热爱和赞美大地的丰饶;在对大地充满深厚的情怀中,反哺之心不断升腾。从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实践中,我们能发现这一社会生活内部关系的鲜明展示。本书在第三、第四章主要考察了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这是中共出版人在现代出版、社会运动、交往实践和社会整合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与社会生活事项中的物质基础、精神生活以及社会交往等紧密相关,反映着具体的社会存在、社会发展和社会联系。这些构成了中共出版人在摩登上海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主要内容,分别揭示了革命出版的时代性、都市运动的社会性、社会交往的先进性、社会动员的大众性。其间的关系可概括为:中共出版人以出版活动为阵地,坚持革命运动,并积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所进行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在大文化领域中将现代性与革命性日益结合并且深入的过程。第三章对出版人的出版理念转变、出版内容、过程及特征等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共出版人现代出版中的革命理想与专业精神之交融。出版理念剖析了革命性与现代性的紧密结合及区别;出版的流程和内容反映着中共出版人力求出版思想和出版专业技术得到有效结合;出版的抗争则包含中共出版人对都市现代性场景、现代性机构和组织以及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综合运用。第四章论述中共出版人参加上海社会活动和运动从而融入大众的历程和特色,体现在该群体利用多重角色,参加工人运动、积极从事相关教育活动、团结先进分子、动员上海整体社会诸方面。将革命热情转化为革命行动,从组织工人运动和学生活动转向对平民大众、市民阶层的启蒙,中共出版人把革命行动和文化教育等结合起来,实际上是想促进更多知识化的无产者接受红色革命思想。其中,在交往实践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出版人在出版界构建了自己的先进文化网络,与上海其他进步人士如鲁迅、陶行知等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拓展了红色革命传播的内涵。

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中共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构建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中心和外围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

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了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中共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中共出版人越来越具有文化的组织和领导能力。

总之,本书试图展现中共出版人作为一个现代重要群体在提升市民文化生活、推进新教育方面的作用,同时揭示其激荡社会潮流、融入社会生活的特征,从中可以发现中共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中共出版人群体和社会其他阶层的融合。由此,可以认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可进一步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红色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

当下,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对中国学术话语重构和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时期,观念的更新是非常明显的。各种论点,包括新的旧的、外来的本土的,变着花样、相互交织,扑面而来。但无论如何,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紧密联系,不能忽视和抛弃。其间,英雄和人民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曾经,中共出版人作为一个带着革命使命和任务的英雄群体,在温暖的大地上不断演绎着民族生命的奇迹;这里,我将其视为思想文化园地中竞妍之群芳,并精心呵护之。由此,我进一步认识到了英雄人物泰山不拒小壤的人文特质。实际上,诚如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所言,除了坚实的大地之外,英雄人物没有任何他们可立足的地方。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且已经创造英雄,并且必将创造更多英雄的时代。我们既向各领域的英雄学习,也在自己的园地中努力开拓,并且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无论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止于抱怨,无济于事,而想方设法使周围的环境更好,使自己脚下的大地更为丰饶,方显英雄本色。

熊十力先生云:“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学术探索的苦与乐,可以凝结成生命的交响曲。曾经的中共出版人,虽多已走远,但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精神,不可磨灭。我常常想,正是因为前人的

栽树,当下的自己,才有幸在云淡风轻的日子里沉浸于宁静的温柔,才有信心在阴云密布的季节里寻找晨光的熹微,才有闲暇将过往和当下亲密牵手,才有平台和先辈徐徐对话。随着学术之路的展开,自己写作的种子不断撒向远方,个人的灵魂不断得以滋养,同时,美德的成长、勇气的提升、智慧的积累,也在加强着自我与生活世界的密切联系。大地广且暖,生活美如斯,我因此更加热爱自己的事业,并诚挚地期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和指正。

本书献给立足于中国大地为大众带来心灵温暖的所有出版人。

杨卫民

2015年11月于上海理工大学

- 一、中共出版人的革命性和现代性 / 001
- 二、社会生活史视角下的红色革命传播 / 003
- 三、关于中共出版人的已有研究成果评析 / 006
- 四、相关概念解析 / 019

第一章 摩登上海与革命潮流：中共出版人都市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 / 024

第一节 多元势态下的上海都市发展 / 024

- 一、多元的政治格局 / 024
- 二、经济的快速发展 / 027
- 三、都市文化的开放和包容 / 028
- 四、国际环境的巨变及其影响 / 031

第二节 现代化潮流中的上海出版业发展 / 033

- 一、上海出版的总体发展 / 033
- 二、各种类型出版的发展 / 037

第三节 革命洪流中的上海红色革命传播 / 044

- 一、从卡内基到马克思：五四时期上海出版人的思想和行动转向 / 044
- 二、中共建党与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1920—1923.12) / 055
- 三、大革命与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1924.1—1927.7) / 062
- 四、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1927.8—1937.12) / 070

第四节 红色革命的内涵：中共出版人社会实践的目标探索 / 080

一、中共出版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主张(1920—1927) / 080

二、中共出版人转向重视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主张
(1927—1937) / 087

第二章 创生与合成：中共出版人群体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 / 090

第一节 创生：中共出版人的发展轨迹与壮大过程 / 090

一、中共党组织的建立与中共出版人的产生和发展(1920—1927) / 090

二、国民党统治下中共出版人的抗争(1927—1936) / 098

三、中共出版人在民族救亡运动中的力量扩展(1936—1937) / 106

第二节 耦合与内聚：关于中共出版人群体的结构分析 / 107

一、年龄、性别和来源地 / 108

二、受教育状况和相关文化活动 / 113

三、中共出版人的红色革命传播活动 / 116

四、中共出版人和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 / 120

第三章 理想与专业的结合：中共出版人的都市出版生活实践 / 123

第一节 中共出版人的出版理念考察 / 123

一、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 / 124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 124

三、促进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团结 / 125

第二节 中共出版机构、出版物及其流程分析 / 128

一、中共出版机构的创办 / 128

二、中共出版人的编辑和组稿 / 159

三、中共出版人与出版物的发行、传播 / 173

四、中共出版人工作流程中的相关场景 / 192

第三节 中共出版人出版实践的阶段、路径及特色 / 196

- 一、出版阶段的变化 / 196
- 二、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并作的两条传播路径 / 197
- 三、出版实践的特色 / 204

第四节 中共出版人的坚持与抗争 / 218

- 一、出版经费困难与中共出版人的坚持 / 218
- 二、出版环境的艰难与中共出版人的抗争 / 229

第四章 多重角色下的革命活动：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加强 / 245

第一节 工人的组织者：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中共出版人 / 245

- 一、对工人的启蒙和组织 / 245
- 二、中共出版人与“五卅”运动 / 253
- 三、中共出版人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 261

第二节 青年的导师：上海教育中的中共出版人 / 263

- 一、中共出版人与平民女校教育试验 / 263
- 二、中共出版人在上海大学的红色革命传播 / 268

第三节 同路人：上海先进文化网络建设中的中共出版人 / 277

- 一、中共出版人在商业出版机构中的组织和文化联系 / 278
- 二、中共出版人在“左联”组织中的活动 / 286

第四节 都市整合者：上海整体动员中的中共出版人 / 296

- 一、利用节假日进行都市民众联合的宣传，扩大影响力 / 296
- 二、通过国共合作，提升社会动员的领导力 / 297
- 三、通过成立和参与地方社团，加强社会动员中的组织能力 / 299

结 语 / 304

附录 在上海工作的中共出版人代表人物简表(1920—1937) / 311

参考文献 / 350

后 记 / 377

绪 论

一、中共出版人的革命性和现代性

现实正不断遗忘着宝贵的历史细节。著名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位于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在其办公楼一楼大厅内，悬挂着该出版机构九位创始人的大幅照片。其间，新知书店的主要创始人徐雪寒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后梳、风度翩翩，形象年轻而出众。就是这样一位已故的中共老出版人，每天上班都要经过此处的三联出版社职工，能认识他的已经寥寥无几。即使是曾经的总经理樊希安，也好长时间不了解徐雪寒到底是谁。近代出版人在当时属高端稀缺人才，他们不少人多才多艺，在其他领域也有探索 and 追求。比如徐雪寒既是出版人，亦在经济领域有所建树。但中国当代最著名的财经媒体人之一胡舒立，在2011年被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①要知道胡舒立的大外公是中共著名出版人胡愈之，外公则是与中共出版人有密切交往的著名出版人胡仲持，胡愈之与徐雪寒都是三联出版社创始人，胡仲持与徐雪寒也是老熟人。

现实的编辑出版现状也在混淆着中共出版人的形象。2010年4月25日，安徽芜湖某重要晚报副刊，整版发表了纪念中共党员、亚东图书馆著名出版人汪原放的文章。可惜在配图时，报社编辑错将汪原放的个人照片以张元济西式着装肖像代替^②，并且相关网站在转载此文章时，也不做必要的改动。在国际互联网络运用如此方便的今天，专业人员在自己应该熟知的领域犯如此明显的错误，

① 从玉华：《一个老派共产党人 徐雪寒（1911—2005）》，《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21日，第12版。

② 胡毓骅：《汪原放 新式标点第一人》，《大江晚报》2010年4月25日，第A15版。

并且好多专业传播者也不自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除了遗忘和疏漏,历史传播中还存在着偏颇。长期以来,在革命史读物和现代性读物当中,近代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形象多是些角色分裂的描述。具体来说,在革命史的教科书中,他们的红色革命精神得到充分描绘,而在出版史的探索中,这种红色革命精神更多让位于现代性的探索。这似乎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他们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或者说,仅是一个分类的存在。此种情况既不能反映历史人物的真实,也不能反映革命史和出版史的真实。比如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就不难发现,一些有名望的中共出版人的名字后面,好多要么只标明政治身份,要么只标明其他职业身份:如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茅盾为“中国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潘汉年为“中国政治家”,薛暮桥为“中国经济学家”,等等;而像胡愈之这样,标明为“中国政治活动家,新闻出版家”的情况少见。^①这种对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和经历的理解与注释,远远不能满足出版史、中共党史和社会生活史等研究的需要。有的老中共出版人还刻意回避自己在上海的个人细微故事,认为这些生活琐事更多是传记文学的内容。如张祺在《上海工运纪事》一书中声明:“我回避了个人生活方面的内容和所见所闻,这些内容往往是传记文章中主要乃至精彩的部分,而仅限于我解放前参加的工作以及上海工人运动的重大事件……”^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认知局限。

然而,不少历史记忆要经常被拾起,因为记忆还在复制着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的宝贵密码;历史的疏漏也需要有人来填补,因为重要的空缺往往决定着价值判断的最终归属;历史传播中的偏颇必须得到纠正,因为严肃认真地对待历史可以使我们免于重蹈覆辙。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一定的问题意识:中共出版人是怎样认识革命、工作与生活的?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视角出发,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因此,寻找合适的突破口,探寻现代性和革命性的共存与交融,成为全面了解中共出版人的新视角,也是进一步探索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出发点。

① 此处所举例子分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第2、6、7、10、4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0、3274、3682、5521和2028页。

②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写在前面的话”,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页。

回眸中国近代出版史,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上海新书业^①得到蓬勃发展,不少中小出版社,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出版文艺和社科读物,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或进步性、现代性,因此所出的书刊,曾经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在动员群众、思想启蒙、呼应革命、促进进步等方面,可以说,“每次革命运动出版工作都走在前面”^②,“中国革命之取得胜利,当年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方面军——出版界是有过重大贡献的”^③。检视中国共产党1920年至1937年的发展历程,中共出版人的作用重大。他们的思想、情感、精神世界和言论、组织、活动等的结合,构造了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主要内容和轨迹;他们本身就是当时上海都市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往往是促进者和弄潮儿。仔细分析这些人物,可以看到:他们既是共产党人,又是出版人;他们既关心普天之下劳苦大众的生活,又必须在日益现代化的都市中为现实的生存、生活而努力奋斗。一方面,他们为传播红色革命而辛劳、冒险,甚至流血牺牲;另一方面,他们也在都市化气氛的日益熏陶中不断培养自己的现代化建设理念。在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紧密结合中,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历史发展图景渐渐映入我们的眼帘,他们的理想、情操和精神生活也越来越清晰地得以呈现。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出版业,从未放弃这一战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多中共出版人就分别活跃在出版事业和出版企业间,很早就明白了出版事业单位和出版企业间的区别。中共出版前辈并没有将两者严格对立起来,而是充分利用出版业本身的共同特征,利用自己所处的都市空间,团结广大进步人士和发动群众,同时利用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独特性,引导和传播红色革命,一定意义上也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

二、社会生活史视角下的红色革命传播

历史学界越来越关注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史研究也日益成为比较受人关注

① 区别于原来以出版教科书为主的老牌大书店。

② 胡愈之:《〈中国出版年鉴〉发刊词》(一九八〇年七月八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鉴·1980》,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页。

③ 陈翰伯:《和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出版史料》第一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的领域。虽然对于社会生活史的概念尚无统一之论^①，但大多学者认为社会生活史在很大意义上属于社会史范畴，不仅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是其中最具特色、内容最为丰富多彩的领域之一。^②从诸多研究中，大致可以归纳出“体系说”和“关系说”两种主要意见。“体系说”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诸方面进行建构，具有一定的静态结构、横断面剖析特征；“关系说”关注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反映社会生活动态生成演变过程的一面。同时，社会生活史概念的广义性和狭义性特征明显，以梁景和教授的研究为例，他认为广义的社会生活是指“人类整体的生活状态，它包括政治生活状态、经济(物质)生活状态、文化(精神)生活状态、社会生活状态”，狭义的社会生活专指“社会生活状态”。^③广义的社会生活可理解为人类生活的整体状态，或可视为一个宏观系统，系统各部分有具体的含义和内容，各分支系统互相联系制约，颇有结构功能主义特色；狭义的社会生活状态也是一个系统，反映的是人类社会最具共性的、普遍的、基本的活动内容，“主要指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生活，诸如闲暇生活、消费生活和娱乐生活。这种生活是人们生活状态最直接的体现，最实在的反映”。^④

依据社会生活史既有研究成果及其框架的展示，生活与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心态、外交、民族等诸多层面的密切联系^⑤，以及历史研究由国家到社会再到

① 乔志强先生、冯尔康先生、林永匡先生、常建华教授、钱杭教授、严昌洪教授、梁景和教授等，对“社会生活”的概念都有专门的研究和理解，基本指向是在历史研究的范畴中关注人们的物质、精神及交往等方面生活发展的规律和关系。见乔志强、陈亚平：《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地位》，周积明等：《中国社会史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4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前言”，沈阳：沈阳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周积明等：《中国社会史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林永匡：《社会生活是历史演进的多棱镜》，《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常建华：《漫谈中国社会生活史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91年第8期；钱杭：《“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的三个关键词》，《史林》2002年第4期；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史》，“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② 还可参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陆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均见《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田居俭：《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庄华峰：《中国社会生活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③ 庄华峰：《中国社会生活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④ 庄华峰：《中国社会生活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⑤ 参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前言”，沈阳：沈阳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生活最终落脚于生态的现代发展趋势,一般认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范围包括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生活观念、社会生活组织以及社会生活变迁与比较、区域社会生活等事项。^①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生活史研究是一次对历史事件和现象、历史运动等客观社会存在内部机制关注度的重新分配,反映出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结构重建过程。主观上说,社会生活史反映了历史研究者一种观察(社会)和体验(生活)相结合的过程,其间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关系。社会生活史研究中蕴含着一种深切的社会关怀,表现为在环境、生活和观念影响下形成的综合人文社会系统中,对生态、生存、生活和生命等事项进行的探索。这里,生命和生态分别对应个体和整体,它们构筑了社会生活的结构;而生存和生活分别对应本能和追求,它们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变迁。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讨论,依然是热点。^②这既反映了历史学研究者的自觉探索精神,也反映了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还未提到应该有的高度。可以说,范式之争的背后,凸显了对社会生活史深入探索的紧迫性。社会生活史从整体视野出发,关注被忽视的人群和被忽视的人生部分,与革命化视角和现代化视角相比,更关注微观,多触及人生的细节,且注意广泛的联系和整合,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对历史更有洞察力。因此,有必要注重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超越范式之争,使历史研究获得更多新的突破。

实际上,有的学者正在超越这种宏大框架下的争论,注重在理论上挖掘与总结“中国经验”。“近年来,近代史学界不断地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号召关注下层的历史,从而使整个中国近代史更为丰满与深入,并由此超越‘革命史’与‘现代化’范式。”^③在社会生活史研究区域化并带有鲜明的社会转型特征过程中,杨念群教授汲取国外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试图建立带有中

① 参看吴宏岐:《区域社会生活史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雒有仓:《关于中国社会生活史的体系问题》,《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② 参见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步平:《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③ 黄国信等:《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层研究特色的新社会史模式^①，忻平教授受中国全息理论的研究成果启发，创立了全息史观^②，这都是社会生活史研究富有创造性和较为深入的本土化探索。笔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生活史研究颇感兴趣，加上在出版社工作的经历，试图在学界前辈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探索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结合，寻求“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结合。^③

由此，本书将以 1920—1937 年上海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为背景^④，从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视角出发，深入探寻中共出版人在现代化的时态和都市场域中的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进而剖析该群体社会生活实践中革命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依此可总结红色革命传播和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

三、关于中共出版人的已有研究成果评析

在国外，美国学者较为重视近代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革命和社会生活实践，代表人物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叶文心、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白鲁恂、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等。

在上海史研究中，叶文心教授比较看重出版现代性和革命性之间的区别。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发表的《从〈生活周刊〉看三十年代上海小市民》^⑤中，她论及了中国共产党人利用出版对上海社会的影响。在对市民生活的论述中，作者明确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影响，并将中共城市斗争以及工人组织与进步知识分子依靠出版文化事业进行革命传播基本看成两条路线，认为这源于中国共产党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矛盾。她曾谈及新中国历史上对都市尤其是商业性都

① 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5 页。

② 详参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 1927—1937》（修订版），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忻平：《全息史观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关于社会生活、现代化（性）、革命化（性）、上海等关键词汇，下文将有专门的解释。

④ 一般认为，上海出版业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即 1920—1937 年的日渐繁荣，逐步达到了民国出版史的顶峰，这也是本书将此时时间段作为分析背景的重要原因。

⑤ （美）叶文心：《从〈生活周刊〉看三十年代上海小市民》，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通往世界之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00—301 页。